

# 独立预测作用, 还是基础性影响?<sup>\*</sup>

## ——价值观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机制

薛婷<sup>1</sup>, 陈浩<sup>2</sup>, 乐国安<sup>2</sup>, 姚琦<sup>2</sup>

(1. 天津中医药大学人文管理学院, 天津 300073; 2. 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 天津 300071)

**摘要:** 为阐明价值观在集体行动参与中的地位 and 影响机制, 研究者以利比亚事件为背景, 针对现实和网络场域中不同程度的 4 类集体行动倾向, 在天津市 957 名大学生中进行问卷调查研究, 结果发现: 价值观显著增加了低成本集体行动倾向解释率, 并调节着情绪、工具性动机和社会认同对集体行动倾向的影响; 中国人进行集体行动决策时具有集体主义理性计算特征; 不同场域和程度的集体行动有其各自规律。结论: 价值观在集体行动参与决策中是一种与社会认同类似的基础性变量。

**关键词:** 集体行动; 价值观; 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 B8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84(2014)01-0068-09

### 1 引言

以往有关集体行动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多是围绕社会认同、群际情绪和工具性动机及其构成的感性和理性路径探索集体行动的发生、发展规律(Simon et al., 1998; Stürmer & Simon, 2004; Stürmer, Simon, Loewy & Jörger, 2003)。近来的研究则在进一步细化原有变量的影响维度和类型之外, 还尝试增加新的影响因素, 其中较受重视和颇具争议的就是价值观变量。

Klandermans(2003, 2004) 在讨论个体参与社会运动的基本动机时, 曾指出除工具性动机和社会认同外, 人们对违背其基本价值观的评估就能激发其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Klandermans, 2003, 2004)。受这一思想启发, 一些研究者开始尝试将价值观作为一种独立于工具理性的新的影响路径, 引入集体行动模型中。Tice(1992) 就曾指出公开的抗议活动能帮助界定和增强自我意识, 这种动机独立于追求改变的动机。Hornsey 等人(2003) 也发现当处于少数地位的人们, 对某一社会问题的态度是建立在强烈道德感的基础之上时, 他们更渴望参与到公开的集体行动中, 这种公开的反从众行为不是受他人影响等工具性动机的驱动, 而仅仅是作为价值表达的一种方式, 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方式(Hornsey, Markut, Terry, & McKimmie, 2003)。Van Stekelenburg

等人所做的跨行动情境和行动类型的研究就发现了价值观作为第 4 种影响因素, 能够显著提高集体行动整合模型的解释力(Van Stekelenburg, 2006; Van Stekelenburg, Klandermans, & Van Dijk, 2009)。

另一方面, 按照 Rokeach(1973) 的定义, “价值观是人们偏爱某种明确的行动模式或存在的终极状态的持续性信念”。Schwartz(1992) 进一步总结了价值观的 5 个主要特征: (1) 是有关信念的概念; (2) 与渴望的终极状态或行为有关; (3) 超越了特定的情境; (4) 指导对行为和事件的选择或评估; (5) 按相对重要性排列(Schwartz, 1992)。这说明价值观因其抽象性等特征有别于并超越于态度, 同时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情感和行动倾向, 正如 Wright(2009) 所言, 道德笃定(moral conviction) 作为群体层面的价值观, 其对行动有更强的驱动作用, 当一些事情被看作是不道德的, 那么不需要其它解释就该反对它, 如果因其它考虑(如个人的偏好、传统规范、潜在的损失) 而没有反对它时, 会引发后悔、羞愧或内疚的情绪。这实际上已暗示出价值观在集体行动模型中对工具性动机和情绪等因素的潜在影响。

虽然人们逐渐认识到价值观对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重要影响, 但目前有关价值观的研究和争论也多是基于西方文化背景下和现实情境下的集体行动, 所涉事件也多与自身或群体利益有关。文化背

<sup>\*</sup>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 项目课题(2010CB731404)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218)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2ASH006)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3YJC190025、11YJC190004、10YJCX051) 天津哲学社科研究规划资助项目(TJXJ12-087)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1CSH043)。

通讯作者: 陈浩, E-mail: hull1919@gmail.com。

景、行为场域(现实和网络)、事件特征和行动类型对集体行动整体规律和价值观作用的影响还很难明确。基于此,研究者尝试在不涉及自身和群体利益的事件背景下,探索价值观对中国人参与集体行动的影响机制,以望能为解决以往争论,明确价值观在集体行动中的地位提供一定的参考佐证。

## 2 研究方法

### 2.1 研究对象

研究者选取了天津市6所大学的本科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1000份,收集有效问卷957份,有效回收率为95.70%。涉及社会学、数学、经济学和计算机等75个专业。

### 2.2 研究工具和研究程序

研究者以“利比亚事件”<sup>\*</sup>为背景,是因为该事件基本不涉及中国人自身的客观利益和本民族(内群体)的利益,并且该事件的特征也较易激发群体水平的认同(即与利比亚人民的认同)以及与全人类的认同。为统一研究情境和被试的背景知识,研究者首先从事件简介、各国官方的反应、民间的反应和英法美三国的新近态度等方面,搜集和整理了当时国内有关该事件的媒体报道,将该材料放于调查问卷的第一部分呈现给调查对象。指导语中指出此次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解大学生对重大国际事件的个人看法”来掩盖调查的真实目的,同时强调匿名和保密原则来减少调查对象的顾虑。

问卷的第二部分是根据国内外的已有集体行动研究编制的各变量的测量题目,并根据初测结果进行了适当的修改。

(1) 社会认同:研究者共涉及3个水平(共4种)的社会认同:与全人类的认同,与利比亚人民的认同以及与集体行动组织方(被调查者所在学校,或大学生社交网站“人人网”)的认同,测量题目来自国外经典研究范式(Simon et al., 1998; Smith, Seeger & Mackie, 2007),并根据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初测结果进行适当的修改。采用7点Likert式量表对相关陈述进行评定(从1代表“非常不同意”至7代表“非常同意”)。4种认同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84、0.69、0.89和0.80。

(2) 情绪:研究者测量了2种情绪:生气和害怕,每种情绪由3个情绪词语来表示(生气:生气、愤怒、反感;害怕:担心、害怕、焦虑)(Smith et al., 2007; Van Zomeren, Spears, Fischer, & Leach, 2004; Yzerbyt, Dumont, Wigboldus, & Gordijn, 2003),并让被调查对象针对材料中反映的西方国家对利比亚内

政的军事干预,以及无辜利比亚平民遭受伤害的情形,根据自己的情绪感受对上述6个词语进行7点评定(从第1级“完全没有”至第7级“非常”)。2种情绪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87和0.80。

(3) 价值观:Schwartz(1992)通过对20个国家的跨文化研究归纳出11种普适性的价值观,并且指出中国人个体层面的价值观符合一般性的构念体现,但集体层面的价值观则自成一套特殊体系,可分为社会和谐价值观(societal harmony)、人际间的道德行为价值观(virtuous interpersonal behavior)和个人的或人际间的和谐价值观(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harmony)(Schwartz, 1992)。研究者选取了该事件可能涉及的前2种集体层面的价值观,并根据事件特点,将人际间的道德观修改为群体间的道德观。根据因素分析结果将2个维度合并取平均值,作为群体水平价值观的指标,得分越高,表示认为西方联军的行为违背这种价值观的程度越低,对其评价越积极。采用7点量表对相关陈述进行评定(从1代表“非常不同意”至7代表“非常同意”),其总体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3。

(4) 集体行动的工具性动机:采用Klandermans的经典研究范式,研究者将集体行动的工具性动机分为4个维度(集体动机、社会动机、收益动机和损失动机),每个维度中的各个题目都分别从价值和重要性的角度进行测量,再将每个题目的两个得分相乘取平均作为该维度的测量指标(Klandermans, 1984; Klandermans & Oegema, 1987; Simon et al., 1998; Stürmer & Simon, 2004)。同样采用7点Likert式量表评定(价值量表:从1代表“非常消极”或“非常不重要”至7代表“非常积极”或“非常重要”;期望量表:从1代表“完全不可能”至7代表“完全可能”)。

(5) 行动类型和参与意愿:研究者根据集体行动的发生环境和风险、成本程度对4种不同的集体行动倾向进行测量:学校组织集体签名活动、学校组织集体示威活动、“人人网”组织集体签名活动(匿名,结果不公开)、人人网组织集体签名活动(不匿名,结果公开)。调查对象对自己参与上述行动的可能性评估就作为行动倾向的测量指标,采用7点Likert式量表评定(从1代表“完全不可能”至7代表“完全可能”)。

问卷的最后还询问了调查对象的性别、年级和院系等基本信息。

\* 注:事件具体情况详见百度百科“利比亚事件”词条内容:<http://baike.baidu.com/view/5399964.htm>

正式施测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采用统一的指导语,并随机分配4种不同行动类型的问卷。收集的数据使用SPSS 13.0和Lisrel 8.70版本进行分析。

### 3 结果

研究者主要通过分组回归的方法,探索各主要变量对不同场域和程度的集体行动的影响规律,以及价值观作为新增变量的解释力。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还通过调节效应分析和复杂模型分析探讨价值观与其它变量的关系及其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机制。

#### 3.1 行动1情境下的回归分析和价值观的调节效应分析

##### 3.1.1 回归分析

将行动倾向作为因变量,将不同维度的社会认同、工具性动机和群际情绪作为第一组自变量,将价值观作为第二组自变量,采取全部纳入的方式进行回归分析。

由表1可知,在学校组织的集体签名活动中,纳入所有变量后,与利比亚人民的认同、集体动机、收益动机、损失动机和价值观对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有直接的预测作用,纳入价值观后的 $R^2$ 增加显著。各自变量的容忍度(最小值为0.421)和膨胀因子值(最大值为2.374)皆表明各个自变量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1 行动1情境下各因素对集体行动倾向的分组回归分析( $n=244$ )

	行动倾向			
	B	SE	$\beta$	$\Delta R^2$
人类认同	-0.03	0.08	-0.02	0.57***
利比亚认同	0.31	0.09	0.22**	
学校认同	-0.01	0.10	-0.00	
生气	-0.01	0.07	-0.01	
害怕	0.01	0.06	0.01	
集体动机	0.06	0.01	0.36***	
社会动机	0.01	0.01	0.03	
收益动机	0.04	0.01	0.20**	
损失动机	-0.03	0.001	-0.18***	
价值观	-0.30	0.10	-0.17**	0.02**

注: \*  $p < 0.05$ , \*\*  $p < 0.01$ , \*\*\*  $p < 0.001$ ,下同。

##### 3.1.2 价值观调节害怕对社会动机的影响

回归分析反映了价值观对现实情境下的低成本集体行动的边缘作用显著,但无法揭示其与各变量间的关系及可能的影响机制。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虽然没有发现价值观与情绪、工具性动机等变量在影响行动倾向中的交互作用,但却发现了价值观能够显著调节害怕对社会动机的影响。暗示了价值观可能并非完全独立于经典的感性和理性路径。

按照温忠麟等人的总结,做此类调节效应前,要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做中心化变换,即变量减去其均

值。由于自变量X(害怕)和调节变量U(价值观)都是连续变量,因此需要做如下的层次回归分析:

$$Y = aX + bU + cXU + e$$

(1) 做Y对X和U的回归,得测定系数 $R_1^2$ 。

(2) 做Y对X、U和XU的回归得 $R_2^2$ ,若 $R_2^2$ 显著高于 $R_1^2$ ,则调节效应显著。或者,作XU的回归系数检验,若显著,则调节效应显著(温忠麟,侯杰泰,张雷,2005)。

如表2所示,价值观在害怕对社会动机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由图1可知,不管价值观如何,害怕对社会动机都存在正向的影响,即由该事件引发的害怕情绪越强烈,人们越重视重要他人的反应(但这种动机对行为并无显著的预测作用)。另一方面,不管社会动机如何,价值评价低分者的社会动机普遍高于高分者。而害怕对社会动机的影响程度随着价值评价的降低、或是价值威胁感的增加而增加,反映出人们在现实情境下面对情绪危机时的可能反应。

表2 行动1情境中价值观调节害怕对社会动机影响的层次回归

	B	SE	$R^2$
第一步: 害怕 X	1.14**	0.39	0.21***
价值观 U	-4.06***	0.62	
第二步: 害怕 X	1.19**	0.39	0.23***
价值观 U	-4.52***	0.65	
害怕 × 价值观 XU	-0.79*	0.35	

注: 社会动机为因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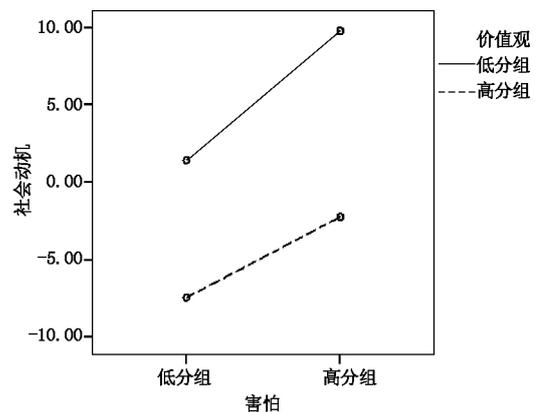


图1 行动1情境中价值观在害怕对社会动机影响中的调节效应图

#### 3.2 行动2情境下的回归分析和价值观的调节效应分析

##### 3.2.1 回归分析

由表3可知,在学校组织的集体示威活动中,只有工具性动机中的集体动机、收益动机和损失动机对人们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有直接的预测作用,价

价值观对应的  $\Delta R^2$  不显著,各自变量容忍度(最小值为 0.41)和膨胀因子值(最大值为 2.47)显示各个自变量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3 行动 2 情境下各因素对集体行动倾向的分组回归分析( $n = 241$ )

	行动倾向			
	<i>B</i>	<i>SE</i>	$\beta$	$\Delta R^2$
人类认同	-0.10	0.10	-0.07	0.36***
利比亚认同	0.11	0.10	0.07	
学校认同	-0.07	0.11	-0.05	
生气	0.10	0.08	0.09	
害怕	0.10	0.08	0.08	
集体动机	0.03	0.09	0.21**	
社会动机	0.01	0.01	0.06	
收益动机	0.05	0.02	0.27**	
损失动机	-0.03	0.02	-0.16**	
价值观	-0.21	0.01	-0.12	0.01

3.2.2 价值观调节害怕对行动倾向的影响

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发现,价值观在害怕对行动倾向、收益动机和社会动机的影响中有显著的调节效应。由表 4 所知,与前述情境不同,在风险和成本较高的现实集体行动情境下,价值观对害怕在 3 种因素的影响上都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即随着价值威胁感的降低,害怕对行动倾向、收益动机和社会动机的影响程度越大。这就表明在此种情境下,害怕作为一种情绪反应可能并非或不只受到价值观的影响,还有其自身的产生和影响机制。

如图 2~图 4 所示,对西方联军的价值评定较为消极的被试,其参与集体行动的倾向性随着害怕感的增加而降低;价值评定较为积极的被试,其行动倾向则随着害怕的增加而增加,达到一定程度后,这种相对受害怕主导的行动意愿就会超过消极价值评定主导下的行动意愿。另一方面,不管价值评定如何,有关该集体行动的社会动机和收益动机都受到害怕情绪的正向影响。由此可以推测,不同水平的价值威胁感中,影响集体行动的机制可能并不相同。此外,回归分析也表明工具性动机可能作为这种调节效应的中介变量,但相关的复杂模型分析中有关的中介路径和调节路径都不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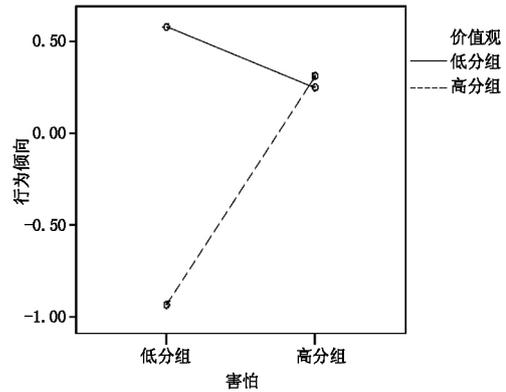


图 2 行动 2 情境中价值观在害怕对行动倾向影响中的调节效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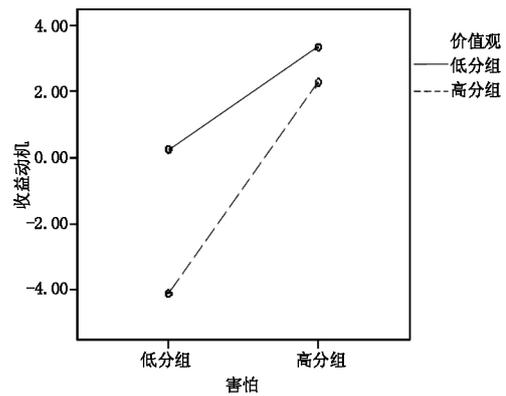


图 3 行动 2 情境中价值观在害怕对收益动机影响中的调节效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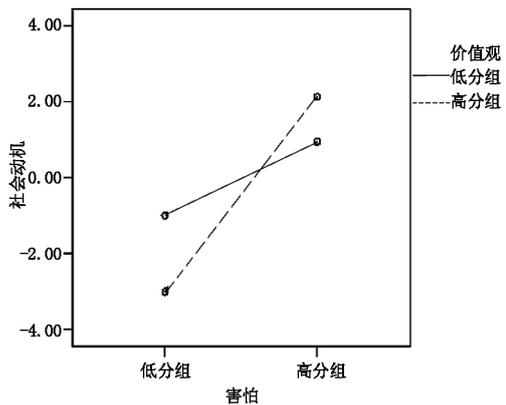


图 4 行动 2 情境中价值观在害怕对社会动机影响中的调节效应图

表 4 行动 2 中价值观调节害怕对行动倾向、收益和社会动机影响的层次回归

	行动倾向			收益动机			社会动机		
	<i>B</i>	<i>SE</i>	$R^2$	<i>B</i>	<i>SE</i>	$R^2$	<i>B</i>	<i>SE</i>	$R^2$
第一步: 害怕 X	0.24**	0.11	0.11***	1.39**	0.43	0.07***	0.87*	0.42	0.04*
价值观 U	-0.46***	0.08		-1.51*	0.61		-1.19*	0.59	
第二步: 害怕 X	0.20*	0.08	0.13***	1.12*	0.44	0.10***	0.62	0.43	0.06**
价值观 U	-0.48***	0.11		-1.63**	0.60		-1.31*	0.59	
XU	0.20*	0.08		1.11**	0.43		0.98*	0.42	

### 3.3 行动3 情境下的回归分析和价值观的调节效应分析

#### 3.3.1 回归分析

由表5可知,在大学生社交网站“人人网”组织的集体签名(匿名)活动中,生气、社会动机、损失动机和价值观对人们的行动意愿有直接的预测作用。与行动1相似,纳入价值观后,  $R^2$  增加显著。各自变量容忍度(最小值为0.50)和膨胀因子值(最大值为1.99)显示各个自变量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5 行为3 情境下各因素对集体行动的倾向的分组回归分析( $n=240$ )

	行动倾向			
	<i>B</i>	<i>SE</i>	$\beta$	$\Delta R^2$
人类认同	0.07	0.09	0.05	0.39***
利比亚认同	0.04	0.10	0.03	
网络认同	0.06	0.10	0.04	
生气	0.17	0.07	0.16*	
害怕	-0.06	0.08	-0.05	
集体动机	0.02	0.01	0.13	
社会动机	0.05	0.01	0.23**	
收益动机	0.02	0.02	0.08	
损失动机	-0.04	0.01	-0.19**	
价值观	-0.33	0.11	-0.20**	0.03**

#### 3.3.2 价值观调节生气对行动倾向的影响

简单的调节效应分析只发现价值观在生气对行动倾向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见表6),即对于价值威胁感较高的人,生气对其参与网络集体行动意向的正向影响要小于价值威胁感较低的人,但前者的行动倾向要普遍高于后者。这暗示了生气可能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需要进一步地深入分析。

表6 行动3 情境中价值观调节生气对行动倾向影响的层次回归

	<i>B</i>	<i>SE</i>	$R^2$
第一步: 生气 X	0.24***	0.07	0.24***
价值观 U	-0.57***	0.11	
第二步: 生气 X	0.25***	0.07	0.27***
价值观 U	-0.50***	0.11	
生气 × 价值观 XU	0.13*	0.05	

注: 行动倾向为因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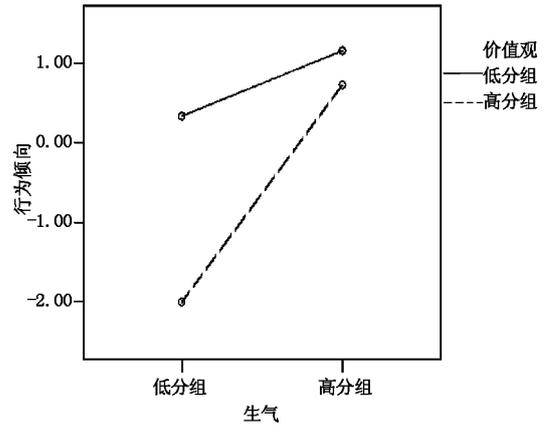


图5 行动3 情境中价值观在生气对行动倾向影响中的调节效应图

#### 3.3.3 生气作为有调节的中介变量

虽然回归分析中,与利比亚人民的认同对行动倾向的预测作用不显著,但进一步分析发现它可能通过生气的中介作用来影响人们的参与意愿。因此,利比亚认同、生气、价值观和行动倾向就组成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按照温忠麟等人的总结,在考虑自变量 X 对因变量 Y 的影响时,中介变量 W 的中介效应受到调节变量 U 的影响,这时就称 W 为有调节的中介变量(moderated mediator)(James & Brett, 1984;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2006)。具体的路径模型和所需矩阵见图6和表7。

表7 中心化变量的协方差矩阵和平均值

	W	Y	X	U	UW
W: 生气	2.77				
Y: 行动倾向	0.98	2.68			
X: 利比亚认同	0.49	0.45	1.27		
U: 价值观	-0.64	-0.70	-0.10	1.04	
UW	0.07	0.74	0.03	-0.41	3.68
平均值	0.00	0.00	0.00	0.00	-0.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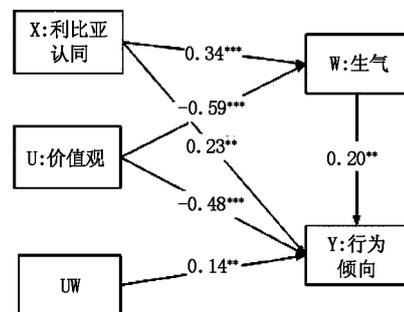


图6 生气作为调节的中介模型

由  $X \rightarrow W$  和  $W \rightarrow Y$  的系数显著,说明生气是利比亚认同和行动倾向间的中介变量,由  $U \times W \rightarrow Y$  的系数显著,说明价值观是生气和行动倾向间的调节变量,从而说明生气是有调节的中介变量(温忠麟等,2006)。为具体分析中介和调节效应,写出 W

和 Y 对各自预测变量的回归方程如下:

$$W = -0.08 + 0.34X - 0.59U \quad (1)$$

$$Y = 0.16 + 0.20W + 0.23X - 0.48U + 0.14UW \quad (2)$$

把(1)代入(2)得

$$Y = 0.14 - 0.61U - 0.08U^2 + (0.30 - 0.05U)X \quad (3)$$

从方程(2)可知,生气(W)的中介作用随着价值观得分(U)的增加而增加,当U = -1.00(低于一个标准差)时,W的系数为0.06,中介效应比为0.34 × 0.06 / 0.23 = 0.09,当U = 1.00(高于一个标准差)时,W的系数为0.34,中介效应比为0.34 × 0.34 / 0.23 = 0.50,增加了5倍多。而从方程(3)可知,Y对X的回归系数是调节变量U的线性函数,并且随着价值观(U)的增加,X对Y的预测作用逐渐减小。理论上,当U等于6时,X对Y的影响就消失,但实际U的范围为[-1.37, 4.06],由此得X的系数范围为[0.10, 0.37]。总的来说,对西方联军的价值评价越积极,价值威胁感越低,与利比亚人民的认同对行动意向的总的预测作用就越小,但其通过生气的中介效应则逐渐增加,反之亦然。该模型反映了三个变量影响集体行动倾向时的复杂机制。

### 3.4 行动4情境下的回归分析和价值观的调节效应分析

#### 3.4.1 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显示,在大学生社交网站“人人网”组

表9 行动4情境中价值观调节害怕对收益和社会动机影响的层次回归

	社会动机			收益动机		
	B	SE	R <sup>2</sup>	B	SE	R <sup>2</sup>
第一步: 害怕 X	1.35***	0.40	0.16***	1.84***	0.38	0.20***
价值观 U	-2.93***	0.57		-2.58***	0.53	
第二步: 害怕 X	1.24**	0.40	0.18***	1.75***	0.38	0.21***
价值观 U	-3.33***	0.60		-2.95***	0.55	
害怕 × 价值观 XU	-0.88*	0.43		-0.85*	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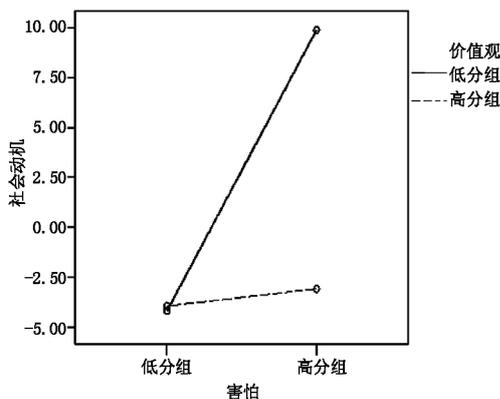


图7 行动4情境中价值观在害怕对社会动机影响中的调节效应图

织的集体签名(公开)活动中,害怕、集体动机和损失动机对人们的行动意愿有直接的预测作用(见表8),与行动2相似,价值观对应的 $\Delta R^2$ 不显著。各自变量容忍度(最小值为0.49)和膨胀因子值(最大值为2.02)显示各个自变量间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8 行动4情境下各因素对集体行动的倾向的分组回归分析(n=232)

	行动倾向			
	B	SE	$\beta$	$\Delta R^2$
人类认同	-0.02	0.09	-0.02	0.45***
利比亚认同	0.13	0.11	0.08	
网络认同	0.11	0.10	0.07	
生气	0.13	0.07	0.13	
害怕	-0.16	0.08	-0.13*	
集体动机	0.08	0.01	0.13	
社会动机	0.01	0.01	0.45***	
收益动机	0.02	0.02	0.07	
损失动机	-0.03	0.01	-0.18**	
价值观	0.01	0.11	0.01	0.00

#### 3.4.2 价值观对害怕和收益动机的调节作用

与行动2的调节效应相似,在这种网络世界中的高成本和高风险的集体行动情境下,价值观在害怕对社会动机和收益动机的影响中同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但与行动2中不同的是,这两种调节的方向都为负,即随着价值威胁感的增加,害怕对社会动机和收益动机的影响越大(见表9和图7、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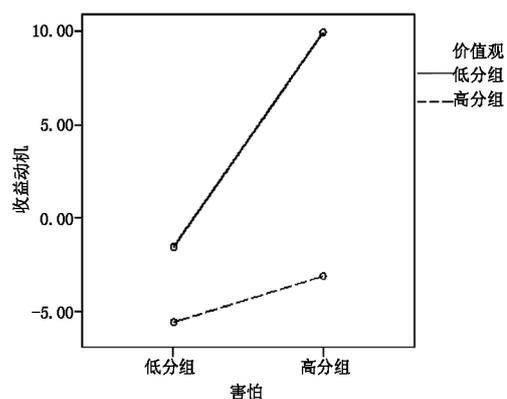


图8 行动4情境中价值观在害怕对收益动机影响中的调节效应图

此外,不同于前3种情境的是,此种情境下,价值观还在收益动机对行动倾向的影响中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见表10和图9),也就是说价值评价越低,个体收益动机受害怕影响加深的同时,其对行动倾向的影响则越小。

表10 行动4情境中价值观调节收益动机对行动倾向影响的层次回归

	B	SE	R <sup>2</sup>
第一步: 收益动机 X	0.08***	0.01	0.24***
价值观 U	-0.26*	0.11	
第二步: 收益动机 X	0.09***	0.01	0.25***
价值观 U	-0.15	0.12	
收益动机 × 价值观 XU	0.02*	0.01	

注: 行动倾向为因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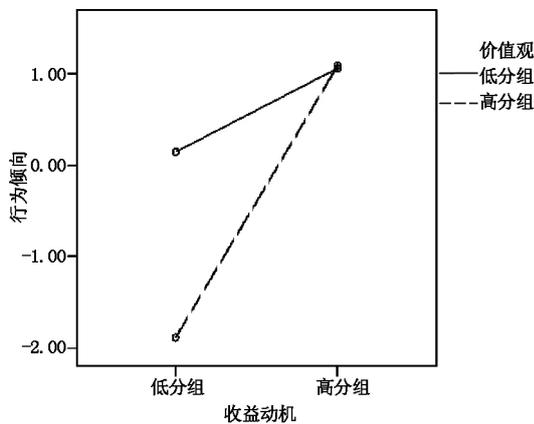


图9 行动4情境中价值观在收益动机对行动倾向影响中的调节效应图

### 3.4.3 收益动机作为有调节的中介变量

进一步分析发现,与利比亚的认同、与人类的认同、价值观、收益动机和行动倾向同样够成了一个有

调节的中介模型,各变量在模型中的意义和协方差矩阵见表11。

由图10可知,该模型中有2个自变量,与人类认同通过收益动机的完全中介作用而影响行动倾向,与利比亚人民的认同则通过收益动机的部分中介作用而影响行动倾向,因此需要对其中的调节和中介效应做进一步分析,按照前述的步骤,首先写出W和Y对各自预测变量的回归方程:

$$W = 0.12 + 1.75X_1 + 1.91X_2 - 0.69U \quad (1)$$

$$Y = 0.07 + 0.08W + 0.32X_2 + 0.03UW \quad (2)$$

把(1)代入(2)得

$$Y = 0.08 - 0.05U - 0.02U^2 + (0.14 + 0.05U)X_1 + (0.47 + 0.06U)X_2 \quad (3)$$

由方程(2)可知,收益动机在利比亚认同和行动倾向间的中介作用随着价值观得分的增加而增加,当U = -0.98(低于一个标准差)时,W的系数为0.05,中介效应比为1.91 × 0.05 / 0.32 = 0.30,当U = 0.98(高于一个标准差)时,W的系数为0.11,中介效应比为1.91 × 0.11 / 0.32 = 0.66,增加了2倍多。由方程(3)可知,X<sub>1</sub>和X<sub>2</sub>对Y的总体影响都随着U的增加而增加,U的实际范围为[-1.41, 4.59],由此得X<sub>1</sub>和X<sub>2</sub>的影响系数的范围分别为[0.07, 0.37]和[0.39, 0.75],都在正向的影响范围内。

综上所述,在此种情境下,与人类的认同和与利比亚人民的认同对行动倾向的正向作用都随着价值威胁感的降低而增加,而后者通过收益动机的中介作用也随之提高,说明人们可能更看重行动给自身带来的归属感和认可感。此外,回归分析中人类认同的负向作用,则暗示了这种认同对行动倾向可能存在其他的影响路径。

表11 中心化变量的协方差矩阵和平均值

	W	Y	X <sub>1</sub>	X <sub>2</sub>	U	UW
W: 收益动机	70.65					
Y: 行动倾向	6.85	2.68				
X <sub>1</sub> : 人类认同	4.47	0.55	1.76			
X <sub>2</sub> : 利比亚认同	3.18	0.63	0.62	1.12		
U: 价值观	-2.82	-0.32	-0.28	0.08	3.59	
UW	2.38	3.14	-0.66	0.23	-4.48	109.93
平均值	0.00	0.00	0.00	0.00	0.00	-2.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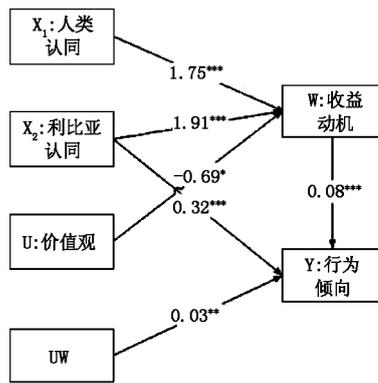


图10 收益动机作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 4 讨论

研究者以利比亚事件为背景,探讨了不同维度的社会认同、群际情绪、工具性动机以及价值观对中国人(主要是大学生)参与现实和网络中不同成本及风险的集体行动意愿的预测作用,重点分析了价值观对情绪和工具性动机的调节作用及相关的复杂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参与不涉及个人和民族利益问题的集体行动的心理规律以及价值观的作用机理。

首先,回归分析中,工具性动机的跨情境显著作用反映出,中国人进行集体行动决策时所具有的兼顾集体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理性特征。但对“集体”的理解和眷顾可能受到行为场域的影响,如现实情境下,人们主要考虑的是学校目标的达成,网络情境下人们则更加重视重要他人的看法。该结果一方面反映了中国集体主义文化和独特的社会行为取向对人们行为决策的整体影响(王俊霞,2005;翟学伟,1998),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网络世界的社交环境和组织规范对人们认知和行为的独特影响(Reicher,Levine & Gordijn,1998),而害怕在网络情境中的显著影响再次验证了网络是人们自主地解决情绪危机的以重要工具或渠道(Coffey & Woolworth,2004)。

其次,以往研究通常将价值观作为独立于工具性动机的影响路径(Hornsey et al.,2003;Tice,1992;Van Stekelenburg,2006),但研究者发现,价值观变量只是在低成本和低风险的集体行动情境下能够显著增加行动倾向的解释率,并且其对情绪、工具性动机和行动倾向具有类似于社会认同的基础性影响,具体的调节效应和复杂模型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可能的影响机制:价值威胁感越低,害怕对工具性动机和行动倾向的影响程度就越小,而生气和收益动机对人们参与网络集体行动的影响就越大,因

此不能将其作为一条独立的影响路径,该结果更符合价值观的定义、特征和相关影响的论述(Rokeach,1973;Schwartz,1992;Wright,2009)。同时也暗示了除社会背景、行为场域外,行动类型、事件背景和所选变量维度都可能是影响结果和解释的主要因素。

因此,鉴于上述发现和研究者对事件背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以在对参与者和事件特征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比较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的特征,发掘其中的规律和差异,并且可以尝试采用实验法等对相关结论进行因果检验和深入分析。

#### 5 结论

总体来看,在不涉及个人和民族利益的事件背景下,中国人参与集体行动时普遍表现出一种集体主义理性特征,价值观并非作为有别于工具性动机的独立影响路径,而是作为基础变量调节着情绪、工具性动机和社会认同对行动倾向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 参考文献

- 王俊霞.(2005).美国的个人主义与中国的集体主义.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3,75-76.
- 温忠麟,侯杰泰,张雷.(2005).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心理学报,37,268-274.
-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2006).有中介的调节变量和有调节的中介变量.心理学报,38,448-452.
- 翟学伟.(1998).中国人社会行动的结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终结.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123-130.
- Coffey, B. & Woolworth, S. (2004). Destroy the scum and then neuter their families: The web forum as a vehicle for community discourse?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1, 1-14.
- Hornsey, M. J., Majkut, L., Terry, D. J., & McKimmie, B. M. (2003). On being loud and proud: Non-conformity and counter-conformity to group norm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2, 319-335.
- James, L. R. & Brett, J. M. (1984). Mediators, moderators, and tests for medi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69, 307-321.
- Klandermans, B. (1984).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Social-psychological expansions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583-600.
- Klandermans, B. (2003). Collective political action. In D. O. Sears, L. Huddy, & R. Jervis (Eds.),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pp. 670-70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landermans, B. (2004). The demand and supply of participa-

- tion: Social – psychological correlates of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In D. A. Snow, S. A. Soule, & H. Kriesi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 (pp. 360 – 379).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Klandermans, B., & Oegema, D. (1987). Potentials, networks, motivations and barriers: Steps toward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519 – 531.
- Reicher, S., Levine, R. M., & Gordijn, E. (1998). More on deindividuation,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groups and the expression of social identity: Three studies on the effects of visibility to the in – group.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7, 15 – 40.
- Rokeach, M. (1973). *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 New York: Free Press.
- Schwartz, S. H. (1992). Universals i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Theoretical advances and empirical tests in 20 countries. In M. Zanna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25 (pp. 1 – 65).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imon, B., Loewy, M., Stürmer, S., Weber, U., Freytag, P., Habig, C., et al. (1998). Coll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646 – 658.
- Smith, E. R., Seger, C. R., & Mackie, D. M. (2007). Can emotions be truly group level? Evidence regarding four conceptual criteria.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3, 431 – 446.
- Stürmer, S., & Simon, B. (2004). The role of collective identification in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 panel study in the context of the German gay movement.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0, 263 – 277.
- Stürmer, S., Simon, B., Loewy, M., & Jörger, H. (2003). The dual – pathway model of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The case of the fat acceptance movement.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66, 71 – 82.
- Tice, D. M. (1992). Self – concept change and self – presentation: The looking glass self is also a magnifying gla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 435 – 451.
- Van Stekelenburg, J. (2006). *Promoting or preventing social change: Instrumentality, identity, ideology and group – based anger as motives of protest particip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Free University.
- Van Zomeren, M., Spears, R., Fischer, A. H., & Leach, C. W. (2004). 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 Explaining collective action tendencies through group – based anger and group effica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 649 – 664.
- Wright, S. C. (2009). The next gener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65, 859 – 879.
- Yzerbyt, V., Dumont, M., Wigholdus, D., & Gordijn, E. (2003). I feel for us: The impact of categoriz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n emotions and action tendenc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2, 533 – 549.

## Predicting Independently or Impacting Fundamentally: The Influence of Value on Collective Action

Xue Ting<sup>1</sup>, Chen Hao<sup>2</sup>, Yue Guoan<sup>2</sup>, Yao Qi<sup>2</sup>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0073;

2. Department of Social Psycholog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To explicit the role and impacting mechanism of value in collective action, this study asked 967 undergraduates to participate in a questionnaire research which was based on the Libyan Event and involved two kinds of online collective action and two kinds of off-line collective action. The results showed: Chinese people showed a collectivism and rational feature when they made decision relating to collective action; collective actions of different fields and different degrees had their own law; value only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low cost collective action's variance, and moderated the impact of emotions, instrumental motivations and social identities on behavioral tendency. Conclusion: value in the collective action was a basic variable like social identity.

**Key words:** collective action; value; moderating effect